

◎ 大党与大国研究 高民政 主 编

大党治理

RUNNING OF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姜 崇 辉 著

时事出版社



大党与大国研究 高民政主编

Running of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大党治理

姜崇辉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党治理/姜崇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 9
(《大党与大国研究》 高民政主编)
ISBN 978-7-80232-173-1

I. 大… II. 高… III. 政党-研究-世界 IV. 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062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52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探索大党与大国的发 展之道——大党与大国研究总序	(1)
导论 大党治理：政党研究的新视 阈	(19)
第一章 五大政党的兴盛与传统治党方略的绩效分析	(47)
一、传统治党方略模式选择与五大政党的兴盛	(48)
二、传统治党方略的特点、内在价值及成功的外部因子	(77)
第二章 五大政党的衰落与传统治党方略的困境透视	(86)
一、大党衰落的表现：政党发展危机	(87)
二、政党发展危机的背景：全球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传统 治党方略回应滞后	(118)
三、政党规模扩大、党力退减：政党治理理念变迁与大党 治理的困顿	(129)
第三章 五大政党复苏的现实观察与思考	(133)
一、重新执政的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和中国国民党的 “治党”模式反观	(134)

二、踟躅中的俄罗斯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治党” 模式剖析·····	(148)
三、五大政党治理显效的主要因素及其隐忧·····	(155)
第四章 社会党转型与绿党兴起的启示 ·····	(170)
一、政党转型与社会党的强大·····	(171)
二、组织创新与绿党的兴起·····	(195)
三、社会党与绿党兴盛的宝贵启示·····	(206)
第五章 超大政党的治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课题 ·····	(214)
一、政党地位的历史变化与角色转移问题·····	(215)
二、超大政党的数量规模与成本效益问题·····	(223)
三、长期执政积攒的显性与隐性问题·····	(227)
四、传统治党方略的局限性问题·····	(235)
第六章 超大政党治理方略的探索 ·····	(246)
一、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	(247)
二、尽量拓展政党的包容性·····	(250)
三、努力保持政党的稳定性·····	(253)
四、强化政党治理的规范性·····	(257)
五、推动政党治理的互动性·····	(261)
六、优化政党组织的适应性·····	(265)
七、增强政党治理的有效性·····	(269)
八、推进政党治理的创新性·····	(272)
第七章 从传统到现代：大党治理的必由之路 ·····	(277)
一、治理理念的变迁与“政党再造” ·····	(278)

目 录

二、政党治理中的“硬件”要素与“软件”要素·····	(287)
三、政党现代化与政党转型·····	(296)
四、大党治理与大党执政：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	(303)
 主要参考文献·····	 (304)
 后记 ·····	 (314)

探索大党与大国的发展之道

——大党与大国研究总序

大党与大国研究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之所以要重点研究政治世界中的大党与大国问题，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并不复杂：探索大党与大国的发展之道，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与大国执政提供理论服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 2007 年底时就拥有了 7400 万党员的名副其实的大党，是一个在超大社会构成的大国中长期执政的超大政党。因此，汲取所有政党特别是大党发展及其在大国执政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需要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和稳固执政地位的超大政党，以及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显得极其重要。对于善于总结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和具有海纳百川学习精神的中华民族的这种现实需求，中国政治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开展重点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成果支持。很显然，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种迫切需要相比较，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党与大国研究的成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我们为自己提出了重点研究大党与大国的任务。

一、“大党”与“大国”： 维度及意义的探讨

“大党”和“大国”概念本身就是大党与大国研究过程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党”和“大国”依然是个既明确又不明确的概念。因此，探讨“大党”和“大国”的维度及其意义就成为大党与大国研究中一项不能不做的基础性工作。下面就此做些发散性的思考。

搞清“大党”和“大国”概念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理解“大”。在汉语辞书的解释中，“大”字有多重含义：在面积、体积、数量、力量等方面超过一般或所比较的；指大小的程度；程度深，范围广；年辈较长的人，也指排行第一的人；敬辞，称有关对方的事物；时间上再往后或往前；旧指大钱；方言中指父亲。在古时“大”音义还通“太”和“泰”。^①而“太”与“大”含义中的某些所指一致：最高、最远、最终；地位、身份最高；辈分更高；表示程度更高；表示过分。^②“泰”字也有表示“极”和“最”的意义。^③根据上述“大”的词义，加入“政党”和“国家”要素，就可以大致清楚何谓“大党”、何谓“大国”了。

就常识或感觉而言，“大党”和“大国”似乎是与外在的、数量和空间有关的规模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一个政党的党员数量多，就可以称之为大党，一个国家的面积大、人口多就可以称之为“大国”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党”和“大国”是相对概念还是绝对概念？

① 《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② 《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③ 《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2页。

这个数量有没有一个具体规模标准呢？这似乎又成为一道难题。要为“大党”和“大国”确定一个具体的绝对数量规模标准很难。因为“大党”和“大国”是与“小党”和“小国”相对应而存在的比较概念。既然是一个比较概念，那必然就有一个比较范围问题。如“大党”的比较范围是什么？是一个国家范围，还是地区范围，抑或世界范围？在上述范围内，是政党与政党之间数量的绝对规模的比较，还是政党的党员人数与其所在范围国民人口总数之间的相对规模的比较？因为比较范围不同，其结论也就可能不同。如在某个微型或小型国家内部的大党，其数量规模甚至不及某个大国的小党；同样，在某个大型国家或超大型国家中的小党，其人员数量和组织规模比那些微型和小型国家党员人数总和还多。如果再加入党员人数与国民人数比例规模这个变量进行分析，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同理，判断其是否“大国”也遇到与“大党”类似的问题：是依据国家面积呢，还是依据国家人口，或是两者？是国家的绝对面积或绝对人口，还是国家的相对面积或相对人口？或者综合考虑国家的绝对面积和绝对人口、相对面积和相对人口各种因素？

问题不仅如此，“大党”和“大国”虽然主要是与数量和空间相关的规模概念，但就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来看，很明显，它还是个内在的与质量和作用有关的功能概念。在人们的日常用语和学术词汇中，“大党”和“大国”往往也是影响“广大”和功能“强大”的代名词。不言而喻，在一般情况下，规模大与影响大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政治世界也有负相关的现象：即规模大未必强大；规模小未必弱小。因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大党还是小党、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是以外在数量规模为标准，还是以内在质量功能为标准，抑或是同时具备两个标准？这很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行事。

那么，在我们所要从事的大党和大国研究中，“大党”和“大国”究竟应该是数量概念还是质量概念？即“大党”和“大国”是指其成员

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还是指其影响广泛，力量强大？甚至是两方面同时兼备？这确实是一大难题。窃以为，对“大党”和“大国”概念的理解在学术上做硬性统一，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毕竟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需要不同的“大党”和“大国”意涵与表达。特别是在某些表达形式和所指内容已经约定俗成甚至习惯化的时候，研究者也应该懂得“众意难违”的道理，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硬地“创造”一个概念，强行确定其内涵并划定其疆界；因为假使这样做了，这个概念很可能只停留在创造者的孤芳自赏、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世界中。如果一个概念永远不能得到社会公众也不能得到学术同行认可，不能发挥其理论和实践功效的话，它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学者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根据现实的需求和研究的需要对所用概念及其内涵做出适当说明。对待“大党”和“大国”概念也应如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党与大国研究》系列中的“大党”和“大国”概念力图把几个方面的涵义统一起来，即《大党与大国研究》系列中选取的大党范本，既包括其党员人数众多、组织规模庞大的政党，同时也包括政党功能强大、影响巨大的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诸如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国国民党等等，这些政党同时具备上述多个方面的“大党”内涵。选取上述大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它们符合两方面的“大党”要素，而且还因为它们所在的国家又是不同类型的大国（国民党因其历史上的兴衰演变，导致其所执政的范围前后有所变化），这对于同属大国之中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具有更为特殊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某些政党虽然在某个具体国家不一定单独称大，但却在国内甚至国际间已经形成密切联系或紧密联盟并产生重大影响，如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因而也可以纳入大党比较研究的范畴。大国是指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国一般也具有丰富的资源、很长的边界线和海岸线、众多的民族和种族，也有悠久的历史（美国除外）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这些自然的、历史

的、文化的特点，是一般中、小国家所不完全具备的，从而也就使大国具有了一般中小国家发展所不曾具有的优势、特质。当然，大国也有不利因素。至于“大国”的研究范本，则以历史和现实中面积与人口都很大的国家为主，如苏联、中国、印度等，同时也包括面积人口较多、政党出现较早、综合影响较大或是普遍获得世人认可的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

虽然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是“大党”（甚至主要是大国中的大党）和“大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孤立地研究大党和大国，不关注或不研究中小政党和中小国家。相反，为了更好地研究大党和大国，我们也不能忽略中小政党（特别是大国中的小党）和中小国家，因为中小政党和中小国家是研究大党和大国过程中的比照对象，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当然，在大党和大国研究中关注中小型政党和中小型国家，不仅仅是政党比较和国家比较研究的需要，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对“大党”和“大国”的界定和分析其实还有一个静态还是动态的问题。因为政党和国家都是一个个有生命的政治共同体，除了部分泡沫化的短命政党和一些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长期处于原子化的政党之外，多数政党和国家都有一个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的“大大小小”的变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党”和“大国”其实也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概念。这在政党中表现最为突出：某些现在看起来不像大党的中小型政党，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大党；而某些现在看来毫无争议的大党，很可能已经走上了变为小党的不归之路。甚至国家也是如此：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以来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大国、现当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大小变化的标本。

如同“大党”与“小党”、“大国”与“小国”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一样，“大党与大国研究”与“小党与小国研究”在学术上只有研究重心的区分，而没有意义大小的区别。虽然如此，但就实践需求而言，大党与大国研究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和重

大的操作意义。因为身处政党政治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中国式政党政治不断发展的压力和挑战，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挑战。

二、“大党”发展与“大党”研究： 价值及方法的考量

大党发展的需求催生了大党研究的需要。大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大党”研究的方向。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需求和方向自然就成为中国大党研究的目的和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在她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与新中国一样经历了一段风风雨雨的成长历程。特别是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一样，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自己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置身事外，也就是说，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应该改革开放。这既是思想理论逻辑上的应然，也是政治实践逻辑的必然。十分可喜的是，这已经成为历史现实中的实然，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开放的表现和结果，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大胆举措，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由于两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尽管相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巨大成就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的课要补，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开放大门已经开启

就不可能再关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那一天并不遥远。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两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具有密切的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其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毕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领导者的改革开放毕竟与被领导对象的改革开放有所不同，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在某些方面如思想意识方面领导者往往应该走在前列，但行动也未必应该如此，这如同战争中虽然领导指挥者也应该有身先士卒的精神和勇气，但不能要求将帅在每一次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都必须冲锋在前一样，因为，一旦发生“三军失帅”的悲剧，“损兵折将”的惨剧就不可避免；但反过来，即便出现“损兵折将”的失误，若三军统帅健在，“损兵折将”的局部失利就完全有可能得到补救，最终取得全局胜利的机会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间也有类似的道理。

毋庸讳言，相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而言，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成功的希望很大，但风险依然不小。这是因为，肩负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外部世界的多重压力，更面临国内环境的复杂影响，甚至是政党内部的各种阻力，举措稍有不慎，便有发生亡党亡国危险的可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有苏共与苏联的前车之鉴。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存在政治风险，但也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没有退路。开弓没有回头箭。机遇大于挑战。时代的大势特别是世界政党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已经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或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一定能够为自己从而也为未来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开辟一条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理论来自实践，理论也应该服务实践。中国政党研究者应该责无旁贷地为中国政党的发展服务。因此，为超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服务就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大党研究的直接目的。如同

中国共产党需要改革开放一样，大党研究也要有改革开放的精神态度和方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政党发展状况，分析国内政党发展态势，革新政党研究的方法，就成为我们搞好大党研究的重要任务和必然选择。

自从产生政党以后，人类政治生活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放眼当今世界，政党几乎无国没有，其影响更是无所不在，说人类已经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毫不为过。透视政党时代的政党世界，人们立刻发现政党世界犹如一个琳琅满目、异常奇妙的万花筒：政党数量成千上万、政党形态千差万别、政党纲领千奇百怪、政党领袖风采各异、政党文化良莠不齐、政党规模大小不一、政党地位高低不同、政党实力相差悬殊、政党执政各有千秋、政党表现迥然差异、政党生命长短有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部世界的政党万象，特别是大党治理、大党执政、大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构建大党思想文化和探索大党发展方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中国的政党状况不仅与建国初期有所不同，而且与改革开放之前也大不一样。这是因为随着“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与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以及在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努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的进程中，除了大陆原有的政党格局之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政党或政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它们不仅在各自范围之内活动形成各自的政党格局，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大陆政党相互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特点就是不同性质、不同形式、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政党合作，政党协商、政党监督、政党竞争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否得到权威人士和权威部门的认可，这种状况表明，一种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格局的中国式的政党政治格局事实上已经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开始形成，两种政党制度也将在“一国四区”和平相处、长期共存，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也不依任何政党意志的客观存在。最有戏剧性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这两个中国最大的政党隔海合作与竞争（有时候也存在斗争），不仅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带来深刻

变化,甚至有可能对中国未来政治面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应该未雨绸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这个超大政党所面临的现实的尤其是未来的严峻挑战,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化挑战为机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政党研究者,通过研究工作为自己所在的大党出谋划策就成为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

政党在不断发展,政党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为了不断发挥为政党发展服务的功能,政党研究方法也需要在继承中不断更新和发展。传统的政党研究方法决不能丢,现代的政党研究方法更要吸收。这里无意论述整个政党研究的方法问题,只想就我们大党研究的主题和方法的取向做一点说明。我们所要进行的大党研究既是一个主题范围,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规模视角,而规模视角关注的重点和取向就是操作问题。西方素来就有重视规模与政治关系研究的传统,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① 中国人虽然很早也有诸如“治大国若烹小鲜”、“治众如治寡”等规模与政治方面的清醒意识和警言妙句,但却鲜有系统的研究著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沪宁曾经呼吁中国政治学者开展“超大社会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② 表明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关注“中国规模与中国政治”研究问题。大党研究包括超大政党研究很显然属于“规模与政治”研究范畴,是对开展“超大社会与民主政治”研究

①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法国的卢梭和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都有这方面的精彩论述。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与爱德华·塔夫特合著《规模与民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一书。

② 参见王沪宁为拙作《中国政府与政治》(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的序言:“构筑中国特有的政治体系模式”。王沪宁认为,与中国政治操作有关的重要问题有五个方面:超大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一党执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源总量有限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之间的关系。王沪宁将“超大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列为五个需要重点研究的操作性问题之首,依笔者理解,主要是因为超大社会规模对中国政治乃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有重大影响,如果不把这个事关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问题搞清楚,中国政治发展和全面发展将会遇到战略和策略贯彻实施方面的难题。

的一种响应。

之所以在政党研究中选取“大党”从规模的视角偏向操作性研究，主要是因为以往政党研究中采用价值性研究方法的人比较多，而且由于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点和优势，中国政党学者对其相当了解，运用也是驾轻就熟，用此研究方法产生的成果也比较丰富，甚至可以说价值性的研究方法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不需要研究者扎堆搞重复劳动。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政党的价值性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性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甚至可以说现代政党的价值性目标已经明确，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党价值目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操作的问题，目前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最缺乏的也是可具操作性的现代政党发展思路 and 对策。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超大政党而言，中小政党的操作经验虽然也能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材料，但大党的操作性经验教训则可能是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宝贵财富。而且相对于价值性的理论而言，操作性的经验往往较少甚至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对操作性经验的借鉴和吸收就少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有可能也必须把大党研究目的的价值性与大党研究过程的操作性统一在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之中。由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出发，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就更有共同基础，不同政党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之间也就有了相互比较、相互补充、相互批评的学术交流话题与价值。

根据以上思考，在大党研究总课题中显然可以确定一系列的具体课题，诸如：大党兴衰、大党治理、大党执政、大党民主、大党外交、大党文化、大党领袖、大党形象等等，都是很有探讨价值的重大问题。同时，端正研究目标态度和确立研究目标也很重要。对于研究者来说，要力争把发扬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建设精神结合起来，不仅要总结大功、分享大功之喜，更要剖析大功之难、揭露大功之丑。只有这样，才能诊断大功之病，医治大功之痛，革除大功之弊，警惕大功之险，规

避大党之祸，探索大党之道，发挥大党之力，实现现代大党之持续发展。

三、“大国”发展与“大国”研究： 中国发展热的冷思考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自有史以来，曾兴起过许多文明中心和大国强国，它们兴盛衰败，消亡崛起，既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又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启示。总的看，古代世界曾有过六大文明中心和十大帝国，近现代则出现过 10 多个世界强国，而未来世界将会进一步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又将会有一些新的大国崛起。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横截面来看，不同的大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所处的发展环境和遇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在中古时期，中国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从贸易来看，都可谓是当时的一个世界级大国或强国。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说：“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有优势。”^①就国力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堪与中国匹敌。如果当时有一个国家会征服世界，那一定是中国”。^②而到近代中国则落伍了。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前的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抗拒、被动式适应与缓慢变迁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653、11页。

^② （美）莱斯特·瑟罗：《21世纪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9页。